

外资企业的退出市场行为

——经济发展还是劳动力市场价格管制？

熊瑞祥 万 倩 梁文泉*

摘 要 本文利用我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库，研究了地区经济发展与最低工资对外资企业退出市场行为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影响外资企业退出市场行为；而最低工资从 25 分位数提高至 75 分位数时，能解释样本期间外资企业退出概率平均值的 20%。相比“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成本导向型”外资企业更容易因为最低工资提高而退出市场：劳动密集度高、规模越大、平均工资低、所在行业低技能劳动力占比高、行业竞争激烈程度较高、产业配套条件较差的行业中的企业更容易受到最低工资上升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 最低工资，外资企业，退出市场

DOI: 10.13821/j.cnki.ceq.2021.04.13

一、引 言

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是我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环境不断优化，逐步成为全球跨国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外资企业在推动我国经济宏观增长（赵文军和于津平，2012；蒋殿春和张宇，2008），与提升企业微观表现方面（Kee and Tang, 2016；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Du *et al.*, 2014），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然而，近年来一些外资企业开始撤离我国，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2015 年年初，松下与夏普宣布回迁日本（人民网，2015¹）；2016 年，诺基亚与飞利浦公司先后关闭了位于上海金桥与深圳的公

* 熊瑞祥，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万倩，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梁文泉，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梁文泉，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大道西 601 号暨南大学经济学院，510632；电话：15216655378；E-mail: liangsuwenquan@163.com。熊瑞祥感谢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17YJC79017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803170）与湖南省教育厅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20K121）的资助。梁文泉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803065）的资助。本文曾在湘潭大学、武汉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与暨南大学报告过，感谢参会者的评论与建议；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设性意见；感谢刘学悦在研究中提供的帮助。文责自负。

¹ 人民网：<http://homea.people.com.cn/n/2015/0109/c41390-26354348.html>，访问时间：2018 年 1 月 24 日。

司;2017年,希捷公司关闭了其在苏州的工厂(新华网,2017²)。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00—2014年间,新的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流入的年平均速度为18%,而原有FDI撤离的年平均速度达到37%。³由此引发的一个相关问题是:引起外资企业退出市场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技术水平不断进步、自有资金不断积累,外资企业对我国经济发展没有那么重要了,因而自发地退出了市场?还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价格管制,如最低工资制度,通过人为地提高用工成本,降低了我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与低技能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进而加速了外资企业的退出呢?

这两种原因对我们认识新时期下外资企业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有着不同的借鉴意义。如果外资企业退出市场主要是因为地区经济的发展,则表明这是市场自发发展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外资企业对我国的经济价值在降低,这种退出是有效率的;这种退出有利于我国的贸易平衡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相反地,如果外资企业退出市场主要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价格管制,则意味着外资企业在我国经济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退出是没有效率的,会降低整个经济吸纳就业,尤其是吸纳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政府需要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合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以减少扭曲,并且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与行政体制改革,不断改善和优化投资环境,以更好地利用外资。

为此,本文利用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与我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库,研究了地区经济发展与最低工资对外资企业退出市场行为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资企业退出市场概率没有显著影响;而最低工资从25分位数提高至75分位数时,能解释样本期间外资企业退出概率平均值的20%。这种影响存在与理论推断一致的异质性:最低工资对外资企业退出市场概率的不利影响随企业劳动密集程度、出口密集度、所在行业低技能劳动力占比与竞争激烈程度的增加而增加;随企业平均工资水平、规模、所在行业在当地的产业配套条件的提高而减少。上述发现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这些发现表明,外资企业退出市场并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自发结果,而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价格管制削弱了我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与低技能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所致。

上述发现对我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本文的发现意味着,外资企业退出我国并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因为

² 新华网: http://m.xinhuanet.com/2017-02/26/c_1120530109.htm, 访问时间: 2018年1月24日。

³ 数据来源: 国家外汇管理局历年国际收支平衡表。该数据中没有包括2015年与2016年数据, 因为我国从2015年开始按照《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进行统计, “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子项不再分“贷方”与“借方”进行统计, 详情请见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15年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报告》。

劳动力市场的价格管制，通过人为地提高用工成本降低了我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与低技能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进而使得外资企业过早地退出了市场。考虑到我国目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58.52%（国家统计局，2016⁴），并且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9.02年⁵，过早地通过劳动力市场价格管制人为地提高企业的用工成本，加速了外资企业退出市场，不利于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增长，不利于我国城市化的顺利推进与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不断加剧的全球竞争正在推动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转移（McDermott，2010），而相比国内资本，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转移的国际资本的流动性更强，且我国的工资水平比亚洲许多发展中国家要高出许多（ILO，2017⁶），我国最低工资的提高会使得亚洲其他低工资国家在吸引外资方面变得更加有优势，进而促使外资向这些低工资国家转移（Donaubauer and Dreger，2016）。

本文接下来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述评，第三部分是我国最低工资制度与数据的介绍，第四部分是理论分析与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设定，第五部分是回归分析，第六部分是稳健性检验，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文献述评

本文同两支文献直接相关：一支文献研究了企业退出市场行为的决定因素，另一支文献研究了最低工资对企业表现的影响。

已有一支文献研究了企业退出市场行为的决定因素。Bernard *et al.* (2006) 发现，来自低工资国家的进口竞争，显著地降低了美国制造业企业的生存概率。杨天宇和张蕾（2009）研究了影响我国制造业企业退出市场的各种因素。与这些研究笼统地关注所有类型企业不同，另一些文献重点研究了特定类型企业的退出市场行为。包群等（2015）的研究表明，外资企业的进入一方面通过加剧市场竞争促进了同行业中内资企业退出市场，但另一方面又通过为内资企业构建上下游产业关联，为内资企业创造了新的市场空间。Che *et al.* (2017) 发现，一个地区对私有产权的保护程度越高，民营企业退出市场的可能性越低。相比这些文献，本文主要研究外资企业的退出市场行为；这样，本文就与研究外资撤离原因的文献联系在一起。一些文献从企业战略管理的角度出发，认为撤资是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调整与重构的需要（自

⁴ 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访问时间：2018年1月24日。

⁵ 资料来源：http://www.gdftu.org.cn/xw/rd/201712/t20171205_907315.htm，访问时间：2018年1月24日。

⁶ 资料来源：http://www.ilo.org/jakarta/whatwedo/publications/WCMS_575280/lang-en/index.htm，访问时间：2018年1月24日。

东放与徐艳梅, 2006)。另一些文献研究了东道国宏观经济环境与政策变化对外资企业海外子公司撤资的影响。胡兴球 (2004) 从理论上分析了外部环境变化对跨国公司撤资的影响, 外部环境包括母国经济状况、来自东道国的市场竞争, 与政府优惠政策的变化。Belderbos and Zou (2009) 研究发现, 东道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是跨国公司重要宏观经济风险之一。李玉梅等 (2016) 基于东部沿海 10 个城市 113 个样本数据发现, 我国的投资环境与行业发展状况、母公司特征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状况都会影响其撤资倾向。这些文献增进了我们对外资企业撤离原因的认识, 与这些文献相比, 本文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具体改进。第一, 本文重点研究了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市场价格管制对外资企业退出市场行为的影响, 二者在理论上都可能增加外资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 但两者有着不同的内涵。准确认识二者对外资企业退出市场行为的影响, 有助于我们在经济发展新阶段实施更加合理的利用外资政策。第二, 现有相关研究主要是理论分析或者相关分析, 本文使用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 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且根据经济学理论使用交互项, 以及使用跨省交界与省内交界地级市对样本, 可以更好地排除遗漏变量问题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得到更加一致的参数估计。第三, 相比现有相关研究, 本文的样本更加具有代表性。李玉梅等 (2016) 使用问卷调查法的好处是可以获得企业多维度的信息, 但其仅仅使用了东部沿海 10 个城市的 133 家企业样本, 因而其结论的外部有效性值得商榷; 而本文使用的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库则更加具有代表性。

第二支文献研究了最低工资对企业表现的影响。这支文献又可以分成两类, 其中一类研究最低工资对企业行为的直接影响, 包括就业 (Hau *et al.*, 2020; 丁守海, 2010)、工资 (马双等, 2012)、员工福利 (Long and Yang, 2016) 与盈利水平 (Draca *et al.*, 2011)。另一类文献研究了最低工资对企业行为的间接影响, 包括盈余管理水平 (陆瑶等, 2017)、僵尸企业形成 (蒋灵多和陆毅, 2017)、企业在职培训 (马双和甘犁, 2013)、出口行为 (孙楚仁等, 2013; Gan *et al.*, 2016)、研发行为 (张晶等, 2014) 与资源配置效率 (刘贯春等, 2017; Mayneris *et al.*, 2014)。这些文献加深了本文对最低工资与企业表现之间关系的认识。相比这支文献, 本文有如下两个方面的改进。首先, 现有文献主要关注最低工资对企业雇佣人数、工资水平、出口表现与福利费用等的影响, 都是假设企业仍然在市场中存活, 主要关注的是短期中最低工资对企业集约边际的影响; 但实际上最低工资可能直接影响企业的退出市场行为, 因而本文研究最低工资对外资企业退出市场行为的影响, 更多地关注的是长期中最低工资对企业扩展边际的影响。其次, 本文详尽地考察了最低工资对企业退出市场行为的作用机制与异质性效果, 并且实证结果和理论推断完全一致。

三、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与数据说明

(一) 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保护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企业公平竞争,1993年11月,我国劳动部发布了《企业最低工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通知。该通知中明确规定,国务院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最低工资制度实行统一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实行统一管理。最低工资率在国务院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工会、企业家协会研究确定。最低工资率一般按月确定,也可按周、日或小时确定。在《规定》中劳动部和人事部重点介绍了国际上通行的确定最低工资率的两种方法:比重法和恩格尔系数法。比重法,即根据城镇居民家计调查资料,确定一定比例的最低人均收入户为贫困户,统计出贫困户的人均生活费用支出水平,乘以每一就业者的赡养系数,再加上一个调整系数。恩格尔系数法,即根据国家营养学会提供的年度标准食物食谱及标准食物摄入量,结合标准食物的市场价格,计算出最低食物支出标准,除以恩格尔系数,得出最低生活费用标准,再乘以每一就业者的赡养系数,最后加上一个调整数。由以上方法计算出最低工资率后,再根据当地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社会救济金和待业保险金标准、就业状况、劳动生产率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等进行必要的修正。

1994年7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确立了最低工资的法律地位。但实施之初,它只在部分城市和地区得到执行,1995年全国仅约130个城市采用该政策(马双和甘犁,2013)。2004年1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通过了《最低工资规定》,将最低工资制度推广至全国。2004年年底,我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建立了最低工资制度,采用月最低工资标准(马双和甘犁,2013)。

(二) 数据说明

借鉴现有文献(David and Wei, 2007)的做法,本文根据企业实收资本占比来界定企业的所有制。结合本文的研究问题,我们只使用了外资企业样本。表1给出了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个数	均值	标准差	p5	p95
企业层面 变量	是否退出	379 902	0.138	0.345	0	1
	固定资产 (千元)	378 545	41801.33	319 067.8	183	138 950.00
	资本劳动比 (千元/人)	365 607	151.879	2 296.585	3.333	493.297
	人年平均工资 (千元)	319 448	22.454	92.836	5	55.333
	是否纯出口企业	364 975	0.228	0.42	0	1
	是否获得补贴	315 260	0.125	0.331	0	1
	所得税税率	348 659	0.085	0.888	0	0.325
地区层面 变量	月最低工资 (元)	2 569	444.176	147.757	240	700
	人均 GDP (元)	2 532	24 632.19	19 450.95	5 283.8	62 522
	职工年平均工资 (元)	2 535	18 468.68	8 189.985	8 437.36	33 665.88
行业层面 变量	平均房价 (元/平方米)	2 529	2 019.738	1 376.199	829.8755	4 393.471
	CR8	4 584	0.397	0.232	0.109	0.872
	初中及以下劳动力占比	523	0.538	0.131	0.287	0.719

注：数据源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作者搜集整理。CR8 表示每年每个 4 位数行业中销售额最大的前 8 家企业的市场份额。

四、理论分析与计量经济学模型

从理论上来看，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的价格管制都会影响外资企业的退出市场行为。Dunning (1981) 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认为，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本国企业的内部化优势与所有权优势会不断增加，竞争力不断增强；而外国子公司的所有权优势相对下降，竞争力不断下降。随着本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本国企业优势增加的结果是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开拓国际市场，而国外子公司优势下降的结果是开始自发地退出市场。该理论推断经济发展会提高外资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林毅夫等，1994），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吸引外资流入的重要决定因素（Cheng and Kwan, 2000）。由此可知，最低工资上升会提高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外资企业退出市场概率。为研究经济发展与最低工资对外资企业退出市场行为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形式的回归模型：

$$exit_{cift} = \alpha + \beta_1 \ln dppc_{ct} + \beta_2 \ln MW_{c,t-1} + \gamma X_{ft} + \delta Z_{ct} + \theta_f + \vartheta_t + \mu_{cift}, \quad (1)$$

其中 α 、 β_1 、 β_2 、 γ 、 δ 、 θ 和 ϑ 为待估计参数，本文主要关心的系数是 β_1 与 β_2 。 c 、 i 、 f 与 t 分别表示地级市、四位数行业、企业与年份； μ_{cift} 表示随机扰动项。式 (1) 中 $exit_{cift}$ 表示外资企业在第 t 年是否退出市场，退出市场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lngdppc_{ct}$ 表示 c 地级市 t 年人均 GDP 的对数。 $\ln MW_{c,t-1}$ 表示企业所在 c 地级市第 $t-1$ 年最低工资的对数；和 Gan *et al.* (2016) 的做法一致，本文对其取对数。企业规模会影响其退出市场行为（张维迎等，2003），为此，本文控制用企业固定资产对数衡量的企业规模。 Z_{ct} 表示企业所在地级市在 t 年的特征，包括市辖区内职工年平均工资收入的对数和平均房价的对数。⁷ 这些地区层面的变量可以控制基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工资水平的考虑而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马双和甘犁，2013）。 θ_f 表示企业固定效应，以控制企业层面不随时间改变的不可观测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ϑ_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以控制全国年份层面逐年变化的不可观测混杂因素，如宏观经济周期。

考虑到经济发展与最低工资对外资企业退出市场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企业层面的异质性，本文还考虑了如下形式的交互项模型：

$$exit_{cift} = \alpha + \beta_1 lngdppc_{ct} + \beta_2 \ln MW_{c,t-1} + \beta_3 lngdppc_{ct} \times X_{ft} + \beta_4 \ln MW_{c,t-1} \times X_{ft} + \gamma X_{ft} + \delta Z_{ct} + \theta_f + \vartheta_t + \mu_{cift}, \quad (2)$$

其中 X_{ft} 表示企业层面的特征变量。

第一， X_{ft} 包括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对数。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资本相对稀缺，一个国家或地区会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积累利润，进而积累资本（林毅夫等，1994）。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优势会逐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的外资企业会因为逐渐失去比较优势而退出市场。因此，经济发展对外资企业退出市场行为的不利影响在劳动密集度越高的企业中越大；因而我们预期地区人均 GDP 对数与企业资本劳动比对数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其他条件相同时，一个企业的资本劳动比越低，总成本中劳动成本占比越高⁸，最低工资上升带来的劳动成本上升对总成本的影响会越大。因此，最低工资上升对企业退出市场行为的不利影响会随着企业资本劳动比的降低而增加；因而本文预期最低工资对数与企业资本劳动比对数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

第二， X_{ft} 包括企业平均工资的对数。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⁷ 借鉴陆铭等（2015）的做法，本文所用房价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该年鉴在“商品房屋销售情况”一栏下公布了各地级市的商品房屋销售额与销售面积，本文据此计算出各地级市历年商品房屋销售的平均价格。

⁸ 不妨假设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则总产出 Y 刚好全部分配给劳动所有者 (wL) 与资本所有者 (rK)。进而，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为 $\frac{wL}{wL+rK} = \frac{w}{w+r(\frac{K}{L})}$ ， $\frac{K}{L}$ 越低，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越高。

的提高,其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会先上升后下降(Kuznets, 1966),产业结构会不断升级,进而技术水平比较低的企业就会逐步退出市场。考虑到技术水平比较低的企业平均工资也较低,因而本文预期地区人均GDP对数与企业平均工资对数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尽管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并不能完全反映企业的工资结构,但可以比较合理地推断:在平均工资较低的企业中,低分位数工资与最低工资标准的差距会更小,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这些企业的影响也应该会更大(丁守海, 2010)。因此,最低工资上涨对企业退出市场行为的不利影响应该会随着企业平均工资的降低而增加,因而我们预期最低工资对数与企业平均工资对数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

第三, X_{fi} 包括“是否纯出口企业”虚拟变量。来我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市场导向型”与“成本导向型”(李玉梅等, 2016; 曹晓蕾, 2006)。“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主要看中我国的国内市场,表现为出口产值占销售额的比例较低;且这类外资企业进入我国市场时发挥了母国资金充裕的优势,表现为资本劳动比比较高。而“成本导向型”外资企业主要看中我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表现为资本劳动比较低;且这类外资企业主要面向国际市场,表现为出口产值占销售额的比例较高。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收入不断增加,国内消费者对“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所生产产品的需求会不断增加。因此,相比“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成本导向型”外资企业更容易因为本国经济发展而退出市场。最低工资上升时,相比看中我国国内市场的“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看中我国廉价劳动力的“成本导向型”外资企业越容易因为受到最低工资提高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而退出市场。为此,本文构建了“是否纯出口企业”虚拟变量作为是否为“成本导向型”外资企业的代理变量。预期地区人均GDP对数与该虚拟变量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最低工资对数与该虚拟变量交互项的系数也显著为正。

第四, X_{fi} 还包括企业固定资产的对数。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来抵消掉经济发展、最低工资上涨给自身造成的不利影响。例如,最低工资上涨使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增加时,相比小规模企业,固定资产规模大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提供抵押品从金融市场或其他途径融资,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给自身带来的不利影响。因而,本文预期地区人均GDP对数与企业固定资产对数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最低工资对数与企业固定资产对数交互项的系数也显著为负。

最后,本文还考虑了经济发展与最低工资上升对外资企业退出市场行为影响在行业层面的异质性:

$$\begin{aligned} exit_{cift} = & \alpha + \beta_1 \ln gdp_{pc_{ct}} + \beta_2 \ln MW_{c, t-1} + \beta_3 \ln gdp_{pc_{ct}} \times I_{it} \\ & + \beta_4 \ln MW_{c, t-1} \times I_{it} + \gamma I_{it} + \delta Z_{ct} + \theta_f + \vartheta_i + \mu_{cift}, \end{aligned} \quad (3)$$

其中的 I_{it} 表示四位数行业层面的特征。

第一, I_{it} 包括四位数行业层面的低技能劳动力占比。一个行业中“初中

及以下学历员工占比”越高，它的技术水平通常来说也越低，该行业中的企业越容易因为经济发展而退出市场。类似地，一个行业中“初中及以下学历员工占比”越高，它的平均工资水平越低，最低工资对该行业的约束更紧，这些行业中企业成本因为最低工资提高而导致的上升幅度越大，越有可能退出市场。为此，本文利用2004年我国工业普查数据，计算了我国2004年制造业4位数行业层面初中及以下劳动力的平均占比，预期此时地区人均GDP对数与该变量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最低工资对数与该变量交互项的系数也显著为正。

第二， I_{it} 还包括行业层面的竞争激烈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产品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行业竞争越激烈，企业的利润越微薄（自东放和徐艳梅，2006）；经济发展或最低工资上升时，这些行业中的企业相比竞争没那么激烈的行业中的企业，更难以用利润来冲销最低工资带来的不利影响。因而，经济发展与最低工资对企业退出市场行为的不利影响应该在竞争越激烈的行业中越大。为此，借鉴现有文献（方芳和蔡卫星，2016；马建堂，1993）的做法，本文利用我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了我国4位数制造业行业-年份层面的CR8指数——每一年中每个行业销售额最大的前8家企业的市场份额；该指数取值越小，表示行业层面的竞争越激烈。预期此时地区人均GDP对数与该变量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最低工资对数与该变量交互项的系数也显著为负。

第三， I_{it} 还包括外资企业所在行业在当地的产业配套情况。企业在考虑是否离开一个地区时，不仅会考虑当地的经济水平与劳动力成本，还会考虑企业所在行业在当地的产业配套情况：外资企业所在行业在当地良好的产业配套，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经济发展与劳动力成本上升给外资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本文借助产品空间（product space）文献的最新进展，度量了每个地级市 c 中每个外资企业所在行业 i 在当地的产业配套情况，将其记为 $Density_i^c$ 。⁹ 该指标度量了与行业 i 联系紧密的那些行业在地级市 c 的比较优势情况，例如，生产手机需要很多配套行业，如果深圳在生产手机的很多配套行业上有比较优势的话，就意味着深圳在手机生产上的产业配套或产业基础较好； $Density_i^c$ 的取值越大，代表城市 c 在行业 i 上的产业配套越好。进一步根据 $Density_i^c$ 的中位数构建了一个代表外资企业所在行业在当地产业配套好坏的虚拟变量，该变量取值为1时表示外资企业所在行业在当地的产业配套较好，取值为0时表示产业配套较差。预期此时地区人均GDP对数与该虚拟变量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最低工资对数与该虚拟变量交互项的系数也显著为负。

本文使用的是企业层面面板数据，而关键解释变量是地级市-年份层面数

⁹ $Density_i^c$ 指标的经济学逻辑与具体构建过程见 Chen et al. (2017)。

据,考虑到同一地级市内不同企业的随机扰动可能存在相关性,借鉴 Bertrand *et al.* (2004) 的做法,本文将标准误聚类到地级市层面。

五、回归分析

本部分中,我们首先根据回归方程(1)进行逐步回归,然后分别根据回归方程(2)和(3)检验企业层面与行业层面的异质性。

(一) 基本模型: 逐步回归

根据回归方程(1),表2汇报了基本模型的逐步回归结果,本文主要关心人均GDP对数与最低工资对数这两个变量系数的符号与大小。第(1)列只控制了地级市层面人均GDP的对数,该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第(2)列进一步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此时,人均GDP对数的系数大小大幅减小,且不再显著;而地级市层面最低工资的对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第(3)列进一步控制了企业规模与年份固定效应。同现有文献的发现一致,规模越大的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越低(张维迎等,2003)。第(4)列进一步控制了市辖区年平均工资的对数,以控制地区层面一般性的工资变化对外资企业退出市场行为的影响。同预期一致,市辖区年平均工资越高,外资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越高。陆铭等(2015)发现,房价会通过影响工资来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为此第(5)列进一步控制了市辖区层面年平均房价的对数。估计结果显示,市辖区房价的对数并不影响外资企业的退出概率。

在控制企业固定效应之后的第(3)—(5)列中,地级市人均GDP对数与最低工资对数对外资企业退出市场概率的影响非常稳健。控制最严格的第(5)列的结果表明:平均来说,地区经济发展对外资企业退出市场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而最低工资提高会显著地增加外资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具体而言,当最低工资从25分位数提高至75分位数时,最低工资的提高幅度约占其平均值的50%。¹⁰这会使得外资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提高约2.74% (=50% × 0.0548)。而样本期间,外资企业的平均退出概率约为13.8%。这意味着当最低工资从25分位数提高至75分位数时,大约能解释外资企业退出市场概率平均值的20% (=2.74%/13.8%),系数大小的经济意义比较合理。表2中的结果与李玉梅等(2016)发现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增加了外资企业的撤资倾向的结论是类似的;不过本文发现的是真实的退出市场行为,而李玉梅等(2016)调查的仅仅是撤资倾向。

¹⁰ 平均工资的75分位数与25分位数分别为550与330, (550-330) / 444.1763 ≈ 50%。

表 2 基本模型：逐步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i>exit</i>	<i>exit</i>	<i>exit</i>	<i>exit</i>	<i>exit</i>
	(1)	(2)	(3)	(4)	(5)
地级市经济发展	-0.0539*** (0.0075)	0.0206 (0.0151)	-0.0052 (0.0177)	-0.0070 (0.0178)	-0.0054 (0.0185)
地级市最低工资		0.1601*** (0.0160)	0.0526** (0.0258)	0.0549** (0.0269)	0.0548** (0.0264)
企业固定资产的对数			-0.0231*** (0.0031)	-0.0230*** (0.0031)	-0.0231*** (0.0031)
地级市平均工资的对数				0.0553* (0.0319)	0.0494 (0.0321)
地级市房价的对数					-0.0224 (0.0151)
企业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321 245	320 779	308 804	306 159	304 405
R 平方	0.009	0.024	0.041	0.042	0.042
企业个数		101 717	93 400	93 336	93 045

注：观测值为企业层面。***、**和*分别表示参数的估计值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表中所有回归结果的标准误均经过地级市层面聚类调整。为节省篇幅，未报告常数项。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二) 企业层面的异质性

根据回归方程(2)，表3报告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最低工资对外资企业退出市场行为的影响在企业层面的异质性。具体而言，第(1)列中控制了地级市人均GDP对数、最低工资对数同企业资本劳动比对数的交互项。估计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影响外资企业的退出市场行为。而最低工资越高，外资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越高；并且同经济学逻辑一致，最低工资对外资企业退出市场行为的负向影响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显著更大。第(2)列中控制了地级市人均GDP对数、最低工资对数同企业平均工资对数的交互项。估计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影响外资企业的退出市场行为。而最低工资越高，外资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越高；并且同经济学逻辑一致，最低工资对外资企业退出市场行为的负向影响在平均工资水平低的企业中更大。

第(3)列中控制了地级市人均GDP对数、最低工资对数与“是否纯出

口企业”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估计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影响外资企业的退出市场行为。而最低工资越高,外资企业的退出市场概率越高;并且相比利润率更高的非纯出口企业,利润率微薄的纯出口企业越容易因为最低工资的提高而退出市场。第(4)列中控制了地级市人均GDP对数、最低工资对数与企业规模的交互项。估计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影响外资企业的退出市场行为。而最低工资越高,外资企业的退出市场概率越高;并且相比规模较大的外资企业,规模越小的外资企业越容易因为最低工资的提高而退出市场。

表3 企业层面的异质性

变量名称	<i>exit</i> (1)	<i>exit</i> (2)	<i>exit</i> (3)	<i>exit</i> (4)
地级市经济发展	-0.0016 (0.0163)	0.0238 (0.0181)	0.0006 (0.0169)	-0.0118 (0.0325)
地级市最低工资	0.1610*** (0.0288)	0.1095** (0.0477)	0.0446* (0.0254)	0.3997*** (0.0529)
地级市经济发展× 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对数	0.0001 (0.0021)			
地级市最低工资× 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对数	-0.0290*** (0.0028)			
地级市经济发展× 企业平均工资的对数		-0.0112 (0.0096)		
地级市最低工资× 企业平均工资的对数		-0.0206* (0.0117)		
地级市经济发展× 企业是否纯出口企业			0.0012 (0.0074)	
地级市最低工资× 企业是否纯出口企业			0.0382*** (0.0094)	
地级市经济发展× 企业固定资产的对数				0.0011 (0.0034)
地级市最低工资× 企业固定资产的对数				-0.0380*** (0.0045)
企业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续表)

变量名称	<i>exit</i>	<i>exit</i>	<i>exit</i>	<i>exit</i>
	(1)	(2)	(3)	(4)
观测值个数	303 468	303 435	298 905	304 405
R 平方	0.050	0.042	0.043	0.046
企业个数	92 695	92 506	90 443	93 045

注：观测值为企业层面。***、**和*分别表示参数的估计值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表中所有回归结果的标准误均经过地级市层面聚类调整。为节省篇幅，未报告常数项。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三) 行业层面的异质性

根据回归方程(3)，表4报告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最低工资对外资企业退出市场行为的影响在行业层面的异质性。具体而言，第(1)列中控制了地级市人均GDP对数、最低工资对数与行业低技能劳动力占比之间的交互项。估计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影响外资企业的退出市场行为；同时，最低工资上升对外资企业退出市场行为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低技能密集型行业。第(2)列中控制了地级市人均GDP对数、最低工资对数与行业竞争激烈程度变量之间的交互项。估计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影响外资企业的退出市场行为。而最低工资越高，外资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越高；并且相比竞争不那么激烈的行业，竞争越激烈的行业中外资企业越容易因为最低工资的提高而退出市场。表4第(3)列控制了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地级市最低工资分别与外资企业所在行业产品配套好坏的交互项。第(3)列的估计结果表明，地级市最低工资与产业配套好坏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这意味着：企业所在行业在当地良好的产业配套，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给外资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一发现也同现实一致：《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报道显示¹¹：伴随着中国最低工资的上升与近两年美国对中国生产产品关税征收的是，一些企业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但因为这些国家的产业配套能力远不如中国，所以转移过去的主要是一些生产链条较短、对产业配套需求相对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例如衣服、鞋子、玩具等生产企业；即便有些像佳能(Canon)这样生产链条较长、对产业配套需求相对较高的电子产品生产企业转移过去了，但它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当地也主要是生产这些电子产品的塑料部件或包装材料等，而生产这些电子产品所需的对产业配套需求较高的其他中间投入品还是从中国或日本进口。

¹¹ “Manufacturers Want to Quit China for Vietnam. They’re Finding It Impossible”, <https://www.wsj.com/articles/for-manufacturers-in-china-breaking-up-is-hard-to-do-11566397989>, 访问时间：2020年1月23日。

表 4 行业层面的异质性

变量名称	<i>exit</i>	<i>exit</i>	<i>exit</i>
	(1)	(2)	(3)
地级市经济发展	-0.0277 (0.0354)	-0.0120 (0.0192)	-0.0004 (0.0123)
地级市最低工资	0.0042 (0.0317)	0.0736*** (0.0276)	0.0604** (0.0260)
地级市经济发展 × 行业的低技能劳动力占比	0.0390 (0.0391)		
地级市最低工资 × 行业的低技能劳动力占比	0.0837** (0.0418)		
地级市经济发展 × 行业的市场集中度		0.0304 (0.0201)	
地级市最低工资 × 行业的市场集中度		-0.0906*** (0.0330)	
地级市经济发展 × 产业配套好坏			-0.0078 (0.0195)
地级市最低工资 × 产业配套好坏			-0.0372** (0.0145)
企业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地级市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304 350	304 350	298 278
R 平方	0.042	0.042	0.042
企业个数	93 038	93 038	91 569

注：观测值为企业层面。***、**和*分别表示参数的估计值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表中所有回归结果的标准误均经过地级市层面聚类调整。为节省篇幅，未报告常数项。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六、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一) 内生性处理

从 Card and Krueger (1994) 比较地理相邻的新泽西州与宾夕法尼亚州来研究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的经典文献开始，现有文献主要通过比较跨州（省）

交界的市（县）中个体的行为差异来处理最低工资经济影响估计中的内生性问题（Dube *et al.*, 2010）。这一做法主要基于以下逻辑：一方面，最低工资主要由州（省）决定，这样，不同的州（省）下的市（县）就有不同的最低工资；另一方面，跨州（省）交界的市（县）之间因为地理上的邻近在很多方面是可比的。Gan *et al.* (2016) 在研究我国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时，利用地理上相邻的广东省与福建省中的企业样本处理了其估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仅仅使用部分跨省相邻样本的不足之处在于，估计结果不一定具有外部有效性。Fan *et al.* (2018) 在研究我国最低工资提高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时，使用了全部跨省相邻的地级市样本来处理其中的内生性问题，这一做法同 Dube *et al.* (2010) 一致。本文借助现有文献（Dube *et al.*, 2010; Fan *et al.*, 2018）的做法，使用全部跨省相邻的地级市样本来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具体而言，第一步，我们构建一个跨省交界的地级市对数据库：如果两个地级市交界但各属于不同的省，则这两个地级市属于一个地级市对。我们给每一个地级市对一个独特的地级市对代码 p 。¹² 第二步，我们将地级市对数据库与之前使用的企业层面面板数据库合并。使用合并的数据库可以有效地减少估计过程中的内生性问题（Fan *et al.*, 2018）：因为此时我们可以控制地级市对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这就有效地控制了地级市对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的潜在影响。正如 Dube *et al.* (2010) 所述，跨州（省）交界的市（县）之间因为地理上的邻近在很多方面是可比的。表 5 第（1）列报告了使用跨省交界地级市样本的回归结果。¹³ 此时，地区经济发展仍然不影响外资企业的退出，而提高最低工资显著地促进了外资企业退出市场。

表 5 使用地级市对内的企业

	<i>exit</i>	<i>exit</i>
	(1)	(2)
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	-0.0171 (0.0458)	-0.0139 (0.0091)
地级市最低工资	0.0719* (0.0409)	0.0994*** (0.0372)

¹² 一个地级市可能同多个地级市跨省交界，例如，河北省的石家庄市同时与山西省的阳泉市、晋中市、忻州市交界。这样，石家庄市在地级市对数据库中就出现 3 次：石家庄市-阳泉市，石家庄市-晋中市，石家庄市-忻州市。石家庄市在地级市对数据库中也就会有 3 个不同的地级市对代码。为处理这种一个地级市在地级市对数据库中出现多次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借鉴现有文献（Fan *et al.*, 2018）的做法，我们报告加权回归结果，其权重为一个地级市在地级市对数据库中出现次数的倒数。

¹³ 表 5 第（1）列中观测值的个数小于正文中基准回归中观测值的个数，是因为我们在使用跨省交界地级市样本时，删除了一个省份中未与其他省份的地级市交界的那些地级市，这些被删除的地级市通常处于一个省份的地理中心，是经济发达地区，删除这些地级市时损失了样本。

(续表)

	<i>exit</i>	<i>exit</i>
	(1)	(2)
企业特征变量	是	是
地级市特征变量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地级市对-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行业-年份交互项的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198 197	963 556
R 平方	0.658	0.588
标准误差聚类	地级市对-年份与地级市	地级市对-年份与地级市

注：观测值为企业层面。***、**和*分别表示参数的估计值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按照 Fan *et al.* (2018) 的做法，我们将标准误差聚类在地级市对-年份与地级市层面。地级市对-年份固定效应表示地级市对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行业-年份固定效应表示行业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为节省篇幅，未报告常数项。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可能有人会担心，跨省交界的地级市除了在最低工资与经济发展水平上有差异之外，还可能在经济政策上有差异，因为不同省份可能有不同的经济政策，因而跨省交界的地级市之间的可比性可能不如省内交界的地级市之间的可比性。为此，我们构建了省内交界的地级市对数据库：如果两个地级市交界且属于同一个省，则这两个地级市属于一个地级市对。表5第(2)列报告了使用省内交界地级市样本的回归结果。¹⁴此时，地区经济发展仍然不影响外资企业的退出，而提高最低工资显著地促进了外资企业退出市场。

(二) 稳健性检验

本小节主要进行了如下5个方面的稳健性检验。(1)使用2003—2014年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数据，考察了研究的时效性。(2)通过进一步控制当地的营商环境与外资企业所在行业在当地的产业配套好坏，来进一步缓解遗漏变量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干扰。(3)通过控制企业是否获得补贴与企业的所得税税率来控制地级市政府可能存在的策略性反应。(4)检验最低工资对外资企业退出市场概率的影响是否在2004年之后因为政策实施强度提高而增加。(5)通过改变企业进入样本的门槛值来尽可能缓解被解释变量的测量误差。在上述稳健性检验中，本文的结论仍然成立。¹⁵

¹⁴ 表5第(2)列中观测值的个数大于正文中基准回归中观测值的个数，是因为当一个地级市同多个地级市省内交界时，该地级市在省内地级市对数据库中会出现多次。

¹⁵ 限于篇幅，本文在发表版本中删除了这些结果，欢迎感兴趣的读者来函索取。

七、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在推动我国经济宏观增长与提升企业微观表现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外资企业呈现出退出我国市场的迹象,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一种观点认为,外资退出中国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自有资金日渐充足的自发结果,表明外资企业对于我国经济的价值在降低。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相比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资金确实日益充足,但外资背后不仅仅是资金,还包括知识、技术、人才与先进管理经验等,这些生产要素对于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外资企业退出中国市场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一些价格管制,如最低工资,降低了我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与低技能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所致。本文的估计结果显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资企业退出市场概率没有显著影响;而最低工资从25分位数提高至75分位数时,能解释样本期间外资企业退出概率平均值的20%。相比“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成本导向型”外资企业更容易因为最低工资提高而退出市场。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仍然存在如下方面的不足,值得进一步改进。外资企业退出市场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迁往了外地,另一种是直接停止经营。这两种退出市场的性质不同,其决定因素也可能不同。并且这两种退出市场行为也有着不同的福利含义:如果只是迁往外地,毕竟还在营业,还在创造GDP与就业;如果直接停止经营,则不再创造GDP与就业了。如果能够对外资企业退出市场行为的这两种情形进行区分,在文献上与政策含义上都具有重要价值。由于这方面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未能对这两种情形进行区分,期待拥有相关数据的研究者能够在后续研究中弥补本文的这一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 [1] 包群、叶宁华、王艳灵,“外资竞争、产业关联与中国本土企业的市场存活”,《经济研究》,2015年第7期,第102—115页。
- [2] Belderbos, R., and J. Zou, “Real Options and Foreign Affiliate Divestments: A Portfolio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9, 40 (4), 600-620.
- [3] Bernard, A. B., J. B. Jensen, and P. K. Schott, “Survival of the Best Fit: Exposure to Low-Wage Countries and the (uneven) Growth of U. S. Manufacturing Plan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6, 68 (1), 219-237.
- [4] Bertrand, M., E. Duflo, and S. Mullainathan, “How Much Should We Trust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Estim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4, 119 (1), 249-275.
- [5] 曹晓蕾,“跨国公司撤资问题探讨——以在华韩资企业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年第5期,第14—19页。
- [6] Card, D., and A. B. Krueger, “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Fast-Food Industry in New Jersey and Pennsylvan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84 (4), 772-793.

- [7] Che, Y., Y. Lu, and Z. Tao,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New Firm Survival",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17, 25 (3), 495-525.
- [8] Chen, Z., S. Poncet, and R. Xiong, "Inter-industry Relatedness and Industrial-policy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China's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7, 45 (4), 809-826.
- [9] Cheng, L. K., and Y. K. Kwan, "What Are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Chinese Experi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0, 51 (2), 379-400.
- [10] David, D., and S. Wei, "Das (Wasted) Kapital: Firm Ownership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in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2007.
- [11] 丁守海, "最低工资管制的就业效应分析——兼论《劳动合同法》的交互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 2010 第 1 期, 第 85—102 页。
- [12] Donaubauer, J., and C. Dreger, "The End of Cheap Labour: Are Foreign Investors Leaving China?", *IZA Working Paper*, 2016.
- [13] Draca, M., S. Machin, and J. V. Reenen, "Minimum Wages and Firm Profita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1, 3 (1), 129-151.
- [14] Du, L., A. Harrison, and G. Jefferson, "FDI Spillover and Industrial Policy: The Role of Tariffs and Tax Holidays", *World Development*, 2014, 64, 366-383.
- [15] Dube, A., T. Lester, and M. Reich, "Minimum Wage Effects Across State Borders: Estimates Using Contiguous Counti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0, 92 (4), 945-964.
- [16] Dunning, J. H., "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 Towards a Dynamic or Developmental Approach",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981, 117 (1), 30-64.
- [17] Fan, H., F. Lin, and L. Tang, "Minimum Wage and Outward FDI from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8, 135, 1-19.
- [18] 方芳、蔡卫星,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成长: 来自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管理世界》, 2016 年第 7 期, 第 63—75 页。
- [19] Gan, L., M. A. Hernandez, and S. Ma, "The Higher Cost of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Minimum Wages and Firms' Export Behavio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6, 100, 81-94.
- [20] Hau, H., Y. Huang, and G. Wang, "Firm Response to Competitive Shocks: Evidence from China's Minimum Wage Polic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20, 87 (6), 2639-2671.
- [21] 胡兴球, "跨国公司在华撤资动因分析", 《亚太经济》, 2004 年第 6 期, 第 32—34 页。
- [22] 蒋殿春、张宇, "经济转型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 《经济研究》, 2008 年第 7 期, 第 26—38 页。
- [23] 蒋灵多、陆毅, "最低工资标准能否抑制新僵尸企业的形成", 《中国工业经济》, 2017 年第 11 期, 第 118—136 页。
- [24] Kee, H. T., and H. Tang, "Domestic Value Added in Export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106 (6), 1402-1436.
- [25] Kuznets, S., *Modern Economic Growth: 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 [26] 李玉梅、刘雪娇、杨立卓, "外商投资企业撤资: 动因与影响机理——基于东部沿海 10 个城市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管理世界》, 2016 年第 4 期, 第 37—51 页。
- [27] 林毅夫、蔡昉、李周, 《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
- [28] 刘贯春、陈登科、丰超, "最低工资标准的资源错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分析", 《中国工业经济》, 2017 年第 7 期, 第 62—80 页。
- [29] Long, C., and J. Yang, "How Do Firms Respond to Minimum Wage Regulation in China? Evidence

- from Chinese Private Firm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6, 38, 267-284.
- [30] 陆铭、张航、梁文泉, “偏向中西部的土地供应如何推升了东部的工资”, 《中国社会科学》, 2015年第5期, 第59—83页。
- [31] 陆瑶、施新政、刘璐瑶, “劳动力保护与盈余管理——基于最低工资政策变动的实证分析”, 《管理世界》, 2017年第3期, 第146—158页。
- [32] 马建堂, “中国行业集中度与行业绩效”, 《管理世界》, 1993年第1期, 第125—130页。
- [33] 马双、甘犁, “最低工资对企业在职培训的影响分析”, 《经济学》(季刊), 2013年第13卷第1期, 第1—26页。
- [34] 马双、张劫、朱喜, “最低工资对中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 《经济研究》, 2012年第5期, 第132—146页。
- [35] 毛其淋、许家云, “跨国公司进入与中国本土企业成本加成——基于水平溢出与产业关联的实证研究”, 《管理世界》, 2016年第9期, 第12—32页。
- [36] Mayneris, F., P. Sandra, and T. Zhang, “The Cleansing Effect of Minimum Wages; Minimum Wages, Firm Dynamics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in China”, *IRES Working Paper*, 2014.
- [37] McDermott, M. C., “Foreign Divestment: The Neglected Area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2010, 40 (4), 37-53.
- [38]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Analysis Unit (RESA), “Wages in the Asia and Pacific: Steady, but Heterogeneous Real Growth”, *Global Wage Report 2016/17 Asia and Pacific supplement*, ILO, 2017, 1-4.
- [39] 孙楚仁、田国强、章韬, “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 《经济研究》, 2013年第2期, 第42—54页。
- [40] 杨天宇、张蕾, “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入和退出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管理世界》, 2009年第6期, 第82—90页。
- [41] 张晶、陆毅、杨治, “我国最低工资水平对民营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 2014。
- [42] 张维迎、周黎安、顾全林, “经济转型中的企业退出机制——关于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一项经验研究”, 《经济研究》, 2003年第10期, 第3—14页。
- [43] 赵文军、于津平, “贸易开放、FDI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基于30个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经济研究》, 2012年第8期, 第18—31页。
- [44] 自东放、徐艳梅, “跨国公司撤资的实证研究”, 《统计研究》, 2006年第2期, 第13—16页。

On Foreign Firms' Exit

—Economic Development or Labor Market Price Regulation?

RUIXIANG XIONG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QIAN WAN WENQUAN LIANG*

(*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nimum wage policy on foreign firms' exit is studied, using the city-level panel data and firm-level data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firms from 2001 to 2009.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found not to affect the exit of foreign manufacturing firms, while the increase of local minimum wage from the 25 percentile to 75 accounts for 20% of the variation of the mean exit rate of foreign manufacturing firms. Compared with "market-oriented" foreign firms, "cost saving oriented" foreign firms are more likely to go out of business owing to the rise of minimum wage. Firms in industries with high labor intensity, high export intensity, low average wages, a relatively high proportion of low-skilled labor in the industry, high industry competition, and poor industrial supporting conditions are more likely to be negatively affected by rising minimum wages.

Keywords minimum wage, foreign firms, exit

JEL Classification O14, L20, R12

* Corresponding Author: Wenquan L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No. 601 Huangpu Dadao West,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Tel: 86-15216655378; E-mail: liangsuwenquan@163.com.